

# 蘇聯政府消滅與改造宗教 的歷史回顧

嵐鷹<sup>1</sup>

二十世紀初蘇俄政權建立，是世界第一個奉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無神論政權，由於強烈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需求，對於宗教的打擊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卻沒有實現徹底消滅宗教的目的。本文按時間先後，從列寧、史大林、談到二戰時期蘇聯政府消滅與改造宗教的轉變，脈絡清晰，條理分明。回顧這段歷史，有助提醒現代基督徒反思教會所經歷的苦難，並從中尋得天主的啓示。

## 前言

在基督宗教傳統中，苦難具有突出的神學意義，天主子耶穌基督降世為拯救人靈，被釘死於十字架，他所受的苦難不單是為人類接受這痛苦，更是藉此痛苦使救贖得以完成。「教會在基督的十字架救贖的奧蹟中誕生，所以教會必須特別在人痛苦的道路上與人相會。」<sup>2</sup> 在教會兩千年的歷史中，教難一直伴隨

---

<sup>1</sup> 本文作者：嵐鷹，出生於中國，現旅居海外，從事中國教會史講授與研究工作。

<sup>2</sup> 若望保祿二世，《論得救恩的痛苦》牧函（1984），見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john-paul-ii/pdf/apost\\_letters/documents/hf\\_jp-ii\\_apl\\_11021984\\_salvifici-doloris\\_zh\\_tw.pdf](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john-paul-ii/pdf/apost_letters/documents/hf_jp-ii_apl_11021984_salvifici-doloris_zh_tw.pdf)

著教會的發展，只是形式有所區別。二十世紀初，蘇俄無神主義政權建立，由於意識形態的分歧和政治鬥爭的需要，對不同宗教團體採取了激烈打壓手段，教會承受了莫大的衝擊與痛苦。重新回顧這段並不遙遠的歷史，有助於提醒現代基督徒反思教會所經歷的苦難，從中領會這苦難對於今日信仰具有何種特殊意義，並在所受的苦難中去找尋天主的啓示。

## 一、馬克思主義之宗教觀

在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敵視一切宗教，馬克思本人認為「宗教是顛倒了的世界觀」、「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sup>3</sup> 宗教與鴉片等同，一切宗教都是毒品，成為共產主義者信奉的圭臬。恩格斯在 1878 年《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形式。」<sup>4</sup>

蘇俄共黨首領列寧 (Vladimir Lenin, 1870~1924) 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sup>5</sup> 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其世界觀是

---

<sup>3</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1995），1~2 頁。

<sup>4</sup> 同上，354 頁。

<sup>5</sup> 國家宗教事務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宗教問題著作選編及講解》

絕對的無神論，與宗教世界觀是完全對立的。要對一切宗教展開堅決鬥爭，強化無神論的宣傳；但出於革命需要，在一定時期內要利用分化宗教團體中的力量，運用統戰策略，在共產黨處於劣勢時期，要和不同宗教團體展開合作。但在與宗教的合作中，「我們永遠要宣傳科學的世界觀，我們必須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徹底性進行鬥爭。」<sup>6</sup> 而且，宗教信仰並非個人私事：

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教並不是私人的事情。我們的黨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覺悟的先進戰士的聯盟。這樣的聯盟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對信仰宗教這種不覺悟、無知和蒙昧的表現置之不理。對我們來說，思想鬥爭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黨的、全體無產階級的事情。<sup>7</sup>

在這種理念指導下，列寧發展了一套比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更加激進的理論；在實踐中，則是直接以國家暴力摧毀宗教。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消滅宗教的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首當其衝的，就是在俄羅斯擁有悠久歷史的東正教會。

## 二、蘇聯消滅宗教政策的措施

自主曆 988 年基輔羅斯受洗後，斯拉夫人與東正教會形成了緊密的聯繫。尤其是沙皇俄國時期，東正教處於國教的地位，享有各種優越的條件。蘇俄政權建立後第二天(1917 年 11 月 8 日)

---

(北京：宗教文化，1999)，155 頁。

<sup>6</sup> 同上，147 頁。

<sup>7</sup> 同上，145 頁。

即發布《土地法令》，宣布沒收「寺院、教堂的土地，連同耕畜、農具、莊園建築和一切附屬物，一律交給鄉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土地將「一律無償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權，成爲全民財產，並交給一切耕種土地的勞動者使用」<sup>8</sup>；此外，亦取消宗教婚姻合法性，只承認世俗婚禮的有效性。1918年1月23日更頒布《政教分離》法令，依據該法令，教會同國家分離，每個公民都有權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戶籍工作只由民政機關，即婚姻和出生登記處辦理，剝奪過去教會所負責的事務，學校同教會分離，國家和地方自治機關不給予任何特權和津貼，凡在俄國屬於教會和宗教團體的全部財產都宣布爲人民的財產，專供祈禱用的建築物 and 物品也只能「根據地方和中央國家政權機關的特別規定，轉交有關宗教團體無償使用」<sup>9</sup>。法令事實上剝奪了教會所有產業，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使其難以在社會立足，加速其衰落。

在思想文化領域，蘇聯政府加強無神論的宣傳，成立戰鬥的無神論組織，並在全國設立分支機構。列寧在1922年發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一文<sup>10</sup>，強調要堅定不移地宣傳無

---

<sup>8</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譯，《蘇聯宗教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0），8頁。

<sup>9</sup> 同上，18~20頁。

<sup>10</sup> 〈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原刊於《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第三期。該雜誌是蘇聯爲開展戰鬥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宣傳而創辦的哲學和社會經濟雜誌，於1922年1月~1944年6月期間在莫斯科出版。見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04.htm>

神論思想，成立專門的雜誌，系統翻譯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以來各類鼓吹無神論思想的書籍。在俄共中央，亦成立反宗教委員會和國家與教會分離委員會，指導各地消滅宗教運動。1922年3月19日，列寧致函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中，提及展開沒收教會珍寶運動，特別指出：

我們務必通過最堅決最迅速的方式去沒收教會的珍寶，這樣我們才能獲得幾億盧布，爲了達到某一政治目標，必須採用一系列殘酷的手段，那就應該用最堅決的方式在最短時間裡實施。我們正是應該在現在最堅決、最無情的向黑幫神職人員開戰，十分殘酷的鎮壓他們的對抗，要讓他們幾十年也忘不了。委派一名精幹的、擅長指揮全俄中央執委會成員或中央政權代表，去舒亞（城市名）通過政治局五名委員給他下達口頭指示，要盡可能多的逮捕當地神職人員、小市民和城市資產階級代表，要以最快的速度審訊，審訊結束時，要槍決其中的黑幫分子……如有可能還要槍決莫斯科和其他幾個宗教中心的黑幫分子。<sup>11</sup>

通過蘇聯檔案顯示，列寧的暴力指示，非常明顯地將矛頭指向一切反抗徵用教會珍寶的神職人員。所謂的教會珍寶，即是歷代沙皇貴族以及百姓對教會的捐贈，主要用於裝飾聖像、苦像及聖髑。在蘇俄共黨中央指揮下，大量教堂及修道院被劫

<sup>11</sup> 〈列寧關於沒收教會珍寶致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的信〉，1922年3月19日，收錄於《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411~414頁。

掠摧毀，神父及修士們被流放及屠殺。1922年3月20日俄共國家政治保衛局副局長溫什利克特向政治局彙報建議：「現在逮捕東正教最高會議成員和大牧首是適時的……必須將所有強烈反對徵收財寶的神父和教徒送往饑餓的波沃爾日耶最饑餓的地區，在那裡將他們作為人民的敵人，在當地饑餓的居民面前示眾。」<sup>12</sup> 在經歷所謂獻寶運動後，從教會沒收的財寶有「黃金總計442公斤，白銀336227公斤，其他貴重金屬1345公斤，重13.13克拉的鑽石33456粒，珍珠4414克，其他貴重寶石共72383塊，重28140克，硬幣20598盧布」<sup>13</sup>。

透過對教會產業的掠奪，使得教會一貧如洗，藉此清洗一批敢於反抗的神職人員，以反革命罪名監禁處決教會領袖。炮製「吉洪案件」<sup>14</sup>，分化東正教神職與信徒的關係，扶植一批「進步神職人員」向黨中央請願，懲治教會中反蘇維埃的神職與信徒，擁護蘇俄反宗教法令。這些「進步神職人員」譴責教會高層，而站在階級敵人一面，配合國際上反蘇反共的論調，譴責牧首吉洪「妄圖阻撓沒收教會珍品賑濟災民的行動，妄圖掀起

---

<sup>12</sup> 〈溫什利克特關於宗教界由於沒收教會珍品而進行活動的報告〉，1922年3月20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卷，423頁。

<sup>13</sup> 〔俄〕赫克著，高驥、楊續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上海：學林，1999），72頁。

<sup>14</sup> 吉洪（Тихон，1865~1925）為當時俄羅斯東正教最高領袖，第十一任牧首。他反對蘇維埃政權對於東正教會的迫害政策，為蘇俄當局所不容，被蘇維埃政權逮捕審訊，1925年死於監禁中，他被東正教視為為信仰而死的殉道者，1989年俄羅斯東正教為其舉行了封聖典禮，尊稱其為聖吉洪。

民眾暴亂，扼殺與他們不共戴天的蘇維埃政權。」<sup>15</sup> 他們假借教會神職的名義，來批鬥東正教會，這種手法，為後來很多共產政權所繼承。

### 三、史達林時期的宗教政策

1924年1月21日列寧去世，但反宗教的措施並沒有終止。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在經歷了殘酷的黨內鬥爭後，成為新的領袖，他是蘇聯歷史上掌權最久的領導人，施政風格比列寧更加暴力殘忍，無論是席捲全俄的大清洗運動，還是對異議人士的迫害，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29年，蘇聯政府開始加速工業化的政策，提高鋼產量成了蘇聯各級政府的重要目標，也成了另一輪打擊宗教運動的開始。著名的砸大鐘運動，為此打擊拉開了序幕，各地教堂的鐘成了掠奪的目標。當局認為，教堂的鐘聲是舊時代的產物，影響了勞動人民的休息與生活，應該拆除熔煉，為國家工業化做出貢獻。

1930年開始，俄共中央政治局下令，開始全面拆除教堂鐘樓，拒絕者將教堂一併拆除，僅從「謝爾吉耶夫聖三一修道院一處就獲得19口大鐘，合8165普特（130噸），熔化燭臺、枝形燭臺、神幡、洗禮盆、銅柵欄及各種裝飾物，獲得約10噸有色金屬。莫斯科自1929年開始，陸續封閉了30~50間教堂，每間教堂都提供了大量銅。比如『金屬公司』員工在1929年被關閉

<sup>15</sup>〈彼得格勒等地「進步神職人員」團體致俄羅斯東正教徒的呼籲書〉，1922年5月10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卷，451頁。

的大謝爾普霍夫耶穌升天教堂，拆鐘 14 口，重達 17 噸；莫斯科河南岸區的聖凱薩琳教堂，拆鐘 21 噸；1930 年被關閉的阿列克西都主教教堂拆鐘 10 噸。」<sup>16</sup> 蘇聯冶金工業部也制定五年計劃，來拆除各地教堂的大鐘。蘇聯輿論也假借人民聲音，對於這場荒謬運動大唱讚歌：

我們是最後聽過教堂鐘鳴的人。從今往後，傍晚的鐘聲、貴族的詩歌、復活節時教堂的胡言亂語、送別死者時陰森森的哀樂，都將遠離我們的子孫。教會啞然、宗教入土，末了的鐘聲乃是宣告他們千年統治終結的喪鐘。然而銅鐘經過無神論者冶煉廠的洗禮，也會唱起讚美勞動之響亮頌歌，機器運轉的雄偉節奏，取代了昔日孱弱的祈禱鐘鳴。<sup>17</sup>

1926 年蘇聯頒布新《刑法典》，對於宗教活動做出了嚴格限制與懲罰措施，規定任何人「在國立和私立學校中向幼年人和未成年人傳授東正教教義，或是違犯此項法律的，判處一年以下勞動改造；為教會或宗教團體的利益而強迫募捐者，判處 6 個月以下勞動改造或 300 盧布以下罰金；宗教或教會組織擅自利用行政、審判或者其他公法上的職權，和擅自行使法人權利者，判處 6 個月以下勞改或 300 盧布以下罰金；在國家或公共

---

<sup>16</sup> 厭然閒居譯，〈工廠拔地起，教堂鐘鳴息〉，2019 年 9 月 9 日載於 <https://sanlier.blog/2019/09/09/%E5%B7%A5%E5%8E%82%E6%8B%94%E5%9C%B0%E8%B5%B7%E5%BC%8C%E6%95%99%E5%A0%82%E9%92%9F%E9%B8%A3%E6%81%AF/>

<sup>17</sup> 同上。



機關、企業中舉辦宗教儀式，或者在上述機關、企業中懸掛某種宗教畫像者，要判處3個月以下勞改或300盧布以下罰金；對以宗教信仰或其他個人信仰為藉口，拒絕或逃避服義務兵役者，要判處剝奪3年以下的自由。」<sup>18</sup>

通過嚴刑峻法，縮小宗教生存空間，許多神職人員在無意中就觸犯了刑法而被監禁、勞改、流放。史達林執政時期，堅持拆除教堂，在首都莫斯科周邊地區，「克里姆林宮內的丘多夫和沃茲涅先斯基大教堂，幾乎『中國城』內的大部分教堂，西蒙諾夫修道院的大部分建築，紅場旁邊的契爾文斯基聖母小教堂和其他許多教堂都被搗毀。」<sup>19</sup>最具代表性的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於1931年被用炸藥摧毀，並在原址上建立游泳館；這座教堂是為紀念1812年戰勝拿破崙入侵而建立，裡面收藏了大量歷史文物，這樣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教堂，最終也難逃被拆除的命運。

史達林認為，拆毀教堂只是表面上消滅宗教，只有把宗教從人的思想意識中消除，才是真正的消滅宗教。神職人員與教徒是傳播宗教的主體，必須要從整體上消滅神職階層，可以借用分化方式，利用「進步神職人員」打擊所謂落後人員，待時機成熟後，將一網打盡，包括「進步神職人員」也在被消滅的

---

<sup>18</sup> 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會與國家（1917~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132頁。

<sup>19</sup> 同上，134頁。

行列之內。在「大清洗」<sup>20</sup>之前，蘇聯一直推動內部消滅政策。1934 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1934）遇刺身亡，他的死成了大清洗的導火索，爲了深挖所謂階級敵人，史達林下令逮捕一批神職人員。1936 年大清洗全面開展，三年內幾乎全部主教及神父均被逮捕關押。1939 年全蘇教堂數量減少三分之一，剩餘的教堂大多數也被改做倉庫、廠房，用作宗教用途寥寥無幾，殘留開放的教堂僅供外國人參觀而被保留下來。<sup>21</sup>

殘留的東正教領袖們開始向蘇共妥協。1927 年牧首謝爾蓋發表宣言，表示要做奉公守法的公民，呼籲流亡海外的俄羅斯正教會的神職與信徒承認蘇維埃政權。輿論普遍認爲這是壓力之下的被迫服從，縱使謝爾蓋牧首積極配合蘇聯各項活動，在大清洗中也飽受折磨，只因他對外代表俄羅斯東正教發言，維護蘇聯當局的宗教迫害政策，才得以保全性命。但其他主教們則沒有那麼幸運，35 名總主教被處決或人間蒸發。彼得格勒地區的神職人員，1937 年比 1936 年較少一半，由 79 人銳減爲 25 人。<sup>22</sup>

史達林發動的大清洗，不僅對東正教是毀滅性的打擊，其他宗教比東正教處境更爲悲慘。天主教會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

---

<sup>20</sup> 1930 年代，蘇共領袖史達林發動的政治清洗運動，從打擊黨內政敵，擴大到對軍隊、知識份子、黨外人士、宗教人士的大屠殺。從 1936~1938 年間，約有 70~120 萬人死於清洗運動。

<sup>21</sup> 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會與國家》，134 頁。

<sup>22</sup> 同上，156 頁。

被視為外國人的宗教團體，與東正教相比，多了一份原罪，在反對蘇維埃政權罪名外，往往被扣上帝國主義間諜的罪名。蘇聯境內天主教全部主教們都被逮捕，流放處決，聖統制瀕於滅亡邊緣。教宗庇護十一世極為關心俄羅斯天主教信友狀況，曾經多次呼籲國際社會關心蘇聯境內的宗教狀況，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廣泛回應，也讓蘇聯當局憂心忡忡。為了挽救俄羅斯教會聖統不被滅絕，教宗庇護十一世任命法國耶穌會士赫爾比尼（Michel-Joseph Bourguignon d'Herbigny, 1880~1957）主教赴莫斯科，暗中重建教會組織。赫爾比尼主教先後建立九個宗座署理區，秘密祝聖了四位主教。<sup>23</sup> 但在蘇聯當局殘酷的迫害政策下，幾位主教先後被逮捕驅逐，蘇聯境內天主教會一度 and 教廷失去聯繫。尤為悲慘的是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徒<sup>24</sup>，在 1920~1930 年

---

<sup>23</sup> 四位主教分別為：Pie Eugène Neveu（1877~1946），法國聖母升天會會士，任命為莫斯科宗座署理，1926 年 4 月 21 日秘密祝聖。Aleksander Frison（1875~1937）生於烏克蘭的德國移民後裔，1926 年 5 月 10 日任命為奧德薩（Odessa）宗座署理。Boļeslavs Slokāns（1893~1981），拉脫維亞人，1926 年 5 月 10 日與 Aleksander Frison 一起接受主教祝聖，任命為明斯克（Minsk）宗座署理。Antoni Malecki（1861~1935），波蘭人，彼得格勒（聖彼得堡）宗座署理。

<sup>24</sup> 1996 年布列斯特會議上烏克蘭和部分白俄羅斯東正教徒改宗羅馬天主教，獲得了時任教宗克萊孟八世（Clemens VIII, 1592~1605 在位）批准，形成了烏克蘭希臘禮（拜占庭禮）教會，為天主教東方禮教會之一，依據 2020 年資料烏克蘭希臘禮信徒 482 萬，占烏克蘭總人口 11.52%。資料來源於：*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Church 2020*（Vatican City: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22）。

代的迫害中，教堂被關閉，神職人員被流放；二戰後的 1946 年，又被蘇聯當局強行與東正教合併，2700 多所堂區被侵佔，數百萬拒絕服從的信徒轉入地下狀態。1924 年底，俄共中央委員會反宗教委員會制定蘇聯天主教條例，對天主教從組織制度、禮儀、語言、教堂的所有權，及神職人員的產生，做了嚴格的要求：「禁止天主教任何修會團體在蘇聯活動，禮儀必須用拉丁語，禁止成立慈善組織，教宗通諭及其他檔案必須由蘇聯政府審查批准後方可發行，主教和司鐸的調動要經蘇聯政府批准，蘇聯政府有權對於主教候選人進行審查。」<sup>25</sup> 蘇共當局視羅馬為反蘇天主教精神中心，開動各種宣傳工具來反對教會；在發行的各類商品包裝上，也要印刷反宗教的宣傳，著名的宣傳有：「教士就是我們的生死仇人！用兩隻眼牢牢瞪住他要緊。讓我們五年計劃四年完成，來答覆教皇的誣讒謗陷，用文化趕跑宗教和酒精。」<sup>26</sup>

1917 年十月革命前，生活在沙皇統治下的穆斯林人數近 2000 萬，主要生活在中亞地區。伊斯蘭教教義及法律在中亞穆斯林聚居區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建立起系統的教法學校，為穆斯林兒童提供宗教教育，這類學校實際上也扮演著教化功能，解決了穆斯林基本教育問題。十月革命後，列寧認為這類學校

---

<sup>25</sup>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反宗教委員會提出的關於蘇聯天主教基本條例草案〉，1924 年 12 月 9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卷，650 頁。

<sup>26</sup> 赫克著，高驊、楊續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349 頁。

存在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號召黨員幹部要與這類泛伊斯蘭主義作鬥爭，關閉宗教學校。雖然黨內有人認為不應該驟然取消穆斯林宗教學校，而應開辦世俗學校與宗教學校並行，用政策鼓勵穆斯林學生進入世俗學校學習；但這一主張並沒有被黨內接納。1919年在中亞穆斯林聚居區展開了關閉宗教學校、清真寺，並沒收教產等活動，引發了穆斯林社會強烈不滿，爆發了「巴斯馬奇運動」<sup>27</sup>。

面對穆斯林的激烈反抗，史達林採取了支持穆斯林中的「進步分子」打擊反動穆斯林，聯共（布）中央<sup>28</sup>宣傳部發布關於與穆斯林宗教運動鬥爭的草案，要求採取司法懲罰與司法外的措施來鎮壓反動穆斯林宗教界，關閉穆斯林宗教學校，關閉清真寺，穆斯林教職人員被劃分為富農階級，沒收財產，流放西伯利亞地區勞改。穆斯林學校的關閉，世俗學校無法滿足眾多兒童求學問題，導致大量兒童失學。在土庫曼斯坦地區，世俗學校只能收容9%學齡兒童，整體中亞穆斯林聚居區，世俗學校只能提供15%~16%學齡兒童入學。<sup>29</sup> 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以暴

---

<sup>27</sup> 巴斯馬奇運動，是指中亞地區穆斯林為反抗蘇聯的消滅伊斯蘭教運動，而爆發的武裝反抗運動，延至1920年代末才被徹底鎮壓。

<sup>28</sup> 蘇聯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稱呼之一，其前身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布爾什維克派；十月革命後，1918年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俄共布；1925年改稱全聯盟共產黨，簡稱聯共布；1952年聯共布十九大上，改黨名為蘇聯共產黨。

<sup>29</sup> 邵麗英，〈蘇聯在中亞伊斯蘭教政策的歷史嬗變〉，《中東問題研究》2017年第1期，218頁。

力拆除清真寺，強迫穆斯林交出一切生產工具，家畜加入集體農莊。清真寺數量急劇下降，在烏茲別克地區十月革命前，清真寺數量 14905 座，到 1936 年僅剩 4830 座；塔什干地區不足革命前三分之一；舍拉巴茨克地區革命前有 101 座清真寺，到 1936 年則全部被摧毀。<sup>30</sup>

蘇聯境內的佛教徒，主要是自沙俄時代即生活在布里亞特（Buryatia）、卡爾梅克（Kalmykia）及唐努圖瓦（Tannu Tuva）三個自治共和國蒙古人的後裔，他們主要信奉藏傳佛教的格魯派。「1916 年布里亞特大約 34 所寺院及 15000 名喇嘛，卡爾梅克有 70 所寺院及 1600 名喇嘛，1923 年增長為 2840 名。在唐努圖瓦總人口 6 萬人中共有 22 所寺廟，2000 名喇嘛。」<sup>31</sup> 這些信奉佛教的地區在十月革命後，尚未受到反宗教運動的波及；但隨著內戰的結束及蘇維埃政權的鞏固，俄共中央開始了針對佛教的打擊運動。

唐努圖瓦共和國曾是蘇聯支持下的自治共和國，該共和國總理庫烏拉·棟杜（1888~1932）是一位還俗僧人，在蘇聯支持下建立圖瓦人民革命黨。由於曾經的僧侶生涯，他對於佛教採取支持態度，1926 年宣布藏傳佛教為國教。他對蘇聯的反宗教政策相當不滿，引起蘇聯方面的警覺。1929 年在史達林安排下，5 位

---

<sup>30</sup> 同上，219 頁。

<sup>31</sup> Hans Braker, "Buddh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nihilation or Survival?", 1980 年 10 月 3 日, [https://biblicalstudies.org.uk/pdf/rcl/11-1\\_036.pdf](https://biblicalstudies.org.uk/pdf/rcl/11-1_036.pdf)

留蘇的圖瓦青年在蘇聯支持下，發動政變逮捕庫烏拉·棟杜，將其解除職務，並於 1932 年處決。新的圖瓦領導階層很快響應蘇聯反宗教政策，開始了打擊佛教運動。大量寺院被關閉，僧侶被流放，在大清洗期間，很多僧侶們被冠以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的罪名被殺害。1943 年史達林以卡爾梅克人曾和納粹德國有關係，而將全部卡爾梅克人流放至西伯利亞，大約 40% 卡爾梅克人死於流亡期間，倖存者直到 1956 年才被放還故里。<sup>32</sup> 對於佛教的清洗與打壓，同樣也發生在蘇聯的衛星國蒙古，蘇聯的宗教迫害政策延伸出過國境之外。

#### 四、蘇聯宗教政策的轉變

1939 年二戰的爆發，對於蘇聯政策的轉變起了推動作用。長期的反宗教運動，嚴重傷害了信教民衆的情感；納粹德國的威脅日益嚴峻，史達林奉行以鄰為壑的外交方針，欺凌周邊弱小國家，並且以武力強佔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發動蘇芬戰爭，攫取卡累利阿地峽，武力迫使羅馬尼亞放棄比薩拉比亞，與蘇聯的摩爾達維亞自治共和國合併，佔領西烏克蘭及波蘭西部地區，在蘇德戰爭前，將西部邊界又向西推移了 150 到 400 公里不等，打造了「東方戰線」。蘇聯以侵略東歐、南歐部分國家所掠奪的領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感，國際聯盟也於 1939 年 12 月將蘇聯除名。

---

<sup>32</sup> Andrey Terentyev, "Tibetan Buddhism in Russia", *The Tibet Journal* 21.3 (1996), pp.60~70.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發動閃擊戰，突襲蘇聯。戰爭初期在德軍凌厲攻勢下，蘇軍一敗塗地，蘇聯軍機未及起飛便被殲滅 800 餘架；基輔戰役中，德軍重創蘇聯西南方軍隊，60 萬蘇軍投降被俘。莫斯科、聖彼德堡被德軍圍困，蘇聯政權危如累卵。在面對生死存亡的關頭，蘇聯統治階層發現宗教的力量可用，東正教牧首謝爾蓋發表聲明，呼籲所有信友團結保衛國家，摒棄過去的恩怨。蘇共內部初期擔憂過去激烈反教政策會引起信徒們的藉機反彈，但現實卻是正教會領袖積極支持國家反對外來侵略。牧首謝爾蓋呼籲所有信徒要有信心，東正教有保家衛國的傳統與信念，並且譴責那些與納粹德國合作的神職是叛國者，為教會所不容。

教會領導階層的表態，使得以史達林為首的蘇共統治階層決定改變以往的滅教政策，轉而利用這股力量，抗擊納粹德國的入侵。蘇聯調整了反宗教政策，允許東正教主教運用廣播設施布道，鼓勵民衆抗擊入侵者，釋放被關押、流放的主教，並為俄羅斯歷史上被東正教尊崇的聖賢平反，代表性事件為諾夫哥羅德大公亞歷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 1220~1263）的平反。歷史上，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率領民衆抵抗瑞典及條頓騎士團入侵，並與蒙古金帳汗國展開周旋，被視為反對外來侵略的英雄人物，他死後被東正教封為聖人，受到後世的敬仰。十月革命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被視為壓迫俄國人民的統治階級，剝削階級的總代表，他的墳墓在 1922 年蘇共發動的反宗教運動中被摧毀，遺骨也從聖三一教堂中被移走及褻瀆。但在二戰爆



發後，他又一夜之間被蘇共樹立為偉大的民族英雄，俄國歷史上其他著名人物，如：德米特里·頓斯科伊（Dmitry Donskoy，1350~1389）<sup>33</sup>、米哈伊爾·庫圖佐夫（Mikhail Kutuzov，1745~1813）<sup>34</sup>都在一夜之間由兇殘暴力的統治階級，變為反抗外來侵略的偉大英雄。

昔日的反宗教宣傳也大幅減少，1942年蘇聯政府出版《俄羅斯教會真相》一書，以數種歐洲文字同時發行，具有明顯外宣功能。在書中，一改十月革命以來對於東正教全盤否定的論調，反復宣傳東正教會在俄羅斯歷史上一貫忠君愛國，在歷次反對外來侵略的戰爭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sup>35</sup>蘇聯政府允許教會在銀行申請設立帳戶，接受捐款，變相承認東正教法人地位。此時，也開始開放部分教堂，釋放在勞改營中的神職人員。最為代表性的是1943年9月4日，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東正教三位領袖：牧首謝爾蓋、列寧格勒和諾夫哥羅德總主教阿列克謝、基輔和卡林斯克總主教尼古拉。三位宗教領袖向史達林陳情教會所遇到的困難，並且保證教會將會全力支持衛國戰爭，史達林也對三位領袖的表態感到滿意。會談結束後，蘇聯政府將昔日德國駐蘇聯大使官邸交由東正教牧首公署管理，

---

<sup>33</sup> 德米特里·頓斯科伊，莫斯科大公，在位期間抵禦蒙古金帳汗國的壓迫；1380年庫里科沃戰役中擊敗金帳汗國軍隊，打破了蒙古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

<sup>34</sup> 米哈伊爾·庫圖佐夫，十九世紀俄國軍事家，1812年衛國戰爭中擊敗了拿破崙，取得了俄法戰爭的勝利。

<sup>35</sup> 傅樹政、雷麗平，《俄國東正教會與國家》，167頁。

作為新的辦公地點，釋放牧首謝爾蓋提出的被關押的 17 名主教，撥付汽車給主教們辦公使用，並且鼓勵東正教展開對外交往，改善蘇聯的國家形像。

在蘇聯政府主導下，1943 年 9 月 8 日東正教會召開了最高宗教會議（距上一次會議召開時隔 26 年）；蘇聯政府派遣飛機運送從集中營釋放的主教赴莫斯科。這次會議，選舉謝爾蓋繼續擔任牧首，並且譴責那些和德軍合作的神職人員，剝奪其教職。大會還特別發表了對蘇聯政府的感謝宣言，感謝領袖史達林及共產黨對於教會的關懷。在表面的祥和之下，蘇聯政府設立東正教事務委員會，主席為卡爾波夫上校，同時也是蘇聯情報機構克格勃（KGB）<sup>36</sup> 的要員。

蘇聯政府意識到昔日激烈的反宗教措施，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在二戰特殊時期的政策轉變，將東正教改造成蘇聯官方需要的工具，更符合蘇聯利益。在對外交往中，蘇聯政府積極利用東正教出訪，向西方展示蘇聯的信仰自由，標誌性事件是 1945 年 6 月蘇聯東正教訪英之行。這次訪問是對 1943 年英國約克大主教訪蘇的回訪，基輔和卡林斯克的尼古拉總主教在返國後，呈交給蘇聯官方一份詳細的訪英報告，在報告中可以看到改造後的東正教是如何配合蘇聯官方政策進行外交活動。依據報告，此次訪英任務有三：一是交換對於大公主義合一運

---

<sup>36</sup> 克格勃（KGB），台灣稱為格別烏，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縮寫中文音譯，是蘇聯時代情報間諜機構。

動 (Ecumenism)<sup>37</sup> 的看法；二是打擊蘇聯東正教的海外教會<sup>38</sup>；三是擴大反天主教同盟，史達林在統治後期繼承了沙俄時代提出的「第三羅馬」，利用俄國東正教來擴大蘇聯在東南歐東正教國家影響，把莫斯科變成世界東正教中心，進而削弱羅馬天主教的影響。

在訪英報告中，由於蘇聯東正教的努力，英國國教會對於卡爾洛瓦茨（俄國海外教會）「持正式的否定態度，在邀請參加正式儀式時，英國國教會總是不理睬他們。費奧寇里多夫神父（海外教會神職）與其他教會代表一樣收到邀請，代表團到達前，英國國教將他的名字劃掉……英國國教表示他們只承認俄羅斯牧

---

<sup>37</sup> 大公合一運動 (Ecumenism) 興起於二十世紀初，在基督新教的教派中興起的一場鼓吹教會合一、各教派聯合的運動，開端是 1910 年基督新教組織的愛丁堡宣教會議，1921 年在日內瓦成立國際宣教協會，1948 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世界基督教聯合會 (WCC) 作為推廣合一的機構。天主教會開始時不贊同這一行動，1928 年教宗庇護十一世禁止天主教徒參與，直至梵二後才開始參與。蘇聯東正教在起初也毫無興趣，但在 1950~1960 年代轉而積極支持合一運動，背後亦是蘇聯政府藉此機會而實現政治目的的產物。大公合一運動在今日依然被很多教派所反對，尤其是新教中的福音派教會，認為是以合一之名而在教義上的妥協。

<sup>38</sup> 十月革命後，一批東正教主教及神父流亡海外，1920 年在君士坦丁堡舉行宗教會議，建立俄羅斯東正教海外教會，1921 年總部設於塞爾維亞的卡爾洛瓦茨。不同於最終選擇與蘇共合作的俄羅斯國內教會，海外教會始終拒絕與蘇維埃政權合作，他們在海外成立自己的神學院，對流亡海外的俄羅斯正教信徒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也是困擾蘇聯政府的棘手問題之一。

首的教會。」<sup>39</sup> 對於天主教，「在所有英國國教會舉行的隆重儀式上，都沒有邀請天主教徒…約克大主教在歡迎代表團時說我們和你們同樣都反對天主教徒。」<sup>40</sup> 東正教海外出訪活動很大程度上幫助蘇聯當局處理一些棘手問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蘇聯的宗教政策在 1953 年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1894~1971) 執政時期出現過反復，但總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總結來說，就是修正了暴力消滅宗教的政策，制定了打擊—限制—改造—滅亡四步走政策，終極目標就是消滅宗教，只是在不同階段側重點各有不同。

在改造教會問題上，克格勃 (KGB) 直接介入東正教神職人員的選拔之中。在赫魯雪夫時期，克格勃的「可靠人員」已經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區和亞美尼亞的格列高利教會，以及其他宗教團體的領導崗位。他預言，這些人將有可能把殘存的「反動東正教泰斗」趕下臺來。<sup>41</sup> 對於世界基督教聯合會 (WCC)，蘇聯政府更是積極支持東正教加入，並且利用這一平臺來為蘇聯政策辯護；東正教代表團團長——都主教尼科季姆——是克格勃著力培養的年輕教會領袖，31 歲即成為主教，主管莫斯科牧首公署對外事務，並且作為蘇聯東正教駐世界基督

---

<sup>39</sup> 〈尼古拉都主教關於英國之行的報告〉，1945 年 6 月，《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十六卷，759 頁。

<sup>40</sup> 同上，759 頁。

<sup>41</sup> [英] 克里斯多夫·安德魯 (Christopher Andrew)、瓦西里·米特羅欣 (Vasili Mitrokhin) 著，王振西等譯，《克格勃絕密檔案》(北京：當代世界，2002)，343 頁。

教聯合會代表團團長。在他的運作下，1969年世基聯大會決議中，既不提及蘇聯入侵捷克，也避免批評蘇聯對宗教的迫害。這一狀況使得一位蘇格蘭聖公会的代表驚奇，他說：「我注意到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蘇聯絕不能受到公開批評。但是眾所周知，蘇聯在侵犯人權方面名列前茅，這似乎不夠公正。我認為這一傳統應該結束了。」<sup>42</sup>

蘇聯利用改造後的東正教來為其對外政策服務，成功掩蓋了其迫害宗教的種種行爲，而且世界基督教聯合會也成為其滲透的重點機關，加劇了基督教教派內部的猜疑與鬥爭，這些都符合蘇聯分化利用乃至最終消滅的方針。在對天主教方面也是如此，蘇聯1940年武力吞併立陶宛後，克格勃也開始派遣成員潛入神學院，成為神父後逐步取代那些忠於羅馬的神職。<sup>43</sup>

## 結語

教會在和不同政權交往時，適時地回顧歷史，更有利於教會生存與發展。本文透過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可以清楚看到該思想對於宗教所抱持的敵對態度。1917年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是世界第一個奉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無神論政權，對於宗教的打擊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卻沒有實現徹底消滅宗教的目的。客觀現實促使共產主義的領袖們開

---

<sup>42</sup> 同上，344頁。

<sup>43</sup> Vilma Narkutė,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Lithuanian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oviet Regime", *New Blackfriars* 87 (2006), pp. 456-475.

始轉換政策，在消滅宗教的終極前提下，不妨在一段時期內和宗教團體建立起一定的合作關係，利用改造宗教為共產黨政權服務，將宗教的核心價值逐步掏空，最終成為披著宗教外殼的黨組織，這樣比單純暴力消滅宗教更節約成本。這一點在史達林執政後期開始愈加明顯，直至蘇聯垮臺為止。蘇聯的打擊—限制—改造—滅亡的策略，對於後來的共產政權，如東歐與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共產國家在制定宗教政策時，都或多或少地參照了蘇聯模式來處理宗教問題。

耶穌基督曾言：「爲了我名字的緣故，人們要下手把你們拘捕、迫害、解送到會堂，並囚於獄中；且押送到君王及總督之前，爲給你們一個作見證的機會」（路廿一 12）。二十世紀教會在無神主義政權統治下所經受的一切苦難，印證了耶穌在福音中所教導的真理，是爲後世所做的勇敢見證。雖有無數不知名的基督徒流血犧牲，他們的苦難與耶穌的苦難結合，成爲他們得救的保障，正如福音所言：「我給你們講了這一切，是要你們在我內得到平安。在世界上你們要受苦難；然而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若十六 33）；而我們也應謹記耶穌基督的訓誨：「看，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群中，所以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子」（瑪十 16）。